

“日照锦衣，遍地似金。”90多年来，照金这片英雄之地，传承着红色基因，见证着昔日的峥嵘岁月与今日的乡村繁荣。

照金是陕西铜川市耀州区的一个镇，宜君是铜川市的一个县。宜君在照金的北边，紧挨着延安市的黄陵县。宜君黄土塬的皱褶里，藏着二伯的家。但那里并非二伯的出生地。大伯、二伯和父亲，都出生在不远处的渭南市富平县老庙镇。父辈们很小的时候，跟随爷爷奶奶逃荒，来到了宜君的一个小山村。一家人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夜宿在村外的半截土窑里。第二天，村里有个男人来到土窑前，对爷爷奶奶说，我看娃们实在可怜，我来送些吃的。爷爷忙站起来作揖致谢。男人将一条破旧布袋放在爷爷脚下，打开来让爷爷看。爷爷一下子惊呆了：布袋里有十几个黑馍和大约30斤玉米。爷爷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顾搓手。出来逃荒几个月，他从来没遇见这么大方的人。只听那男人说，饥荒年月，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我家的日子还能凑合，能糊住几张嘴，就是缺个娃娃。你们带三个娃娃逃荒，怕是养不活，不如送我一个，给娃留条活路。爷爷这才明白男人为啥送来吃食，顿时耷拉下脑袋，更说不出话来。奶奶将三个娃娃揽在怀里，生怕那男人抢了去。那男人耐心劝说了一阵，爷爷终于抬起头来，看了男人一眼，然后扭头低声对奶奶说，给吧，给吧，给娃一条活路吧。奶奶迟疑了半晌，慢慢松开了手，掩面而泣。爷爷对那男人说，老哥你挑吧。那男人说，我不挑大的，也不挑小的，就挑中间这个。爷爷背过去身，摆摆手说，老二就老二吧，你快领走吧，省得我反悔。爷爷说着，闭上了眼睛，捂住了自己的耳朵，不想听见亲人的哭声。

收养二伯的那家人并不富裕。

我的家乡位于皖中丘陵，一到秋日，展现在眼前的就是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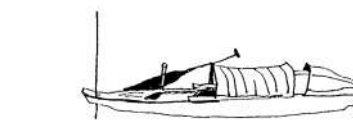
从地里收回的果实，带着扑鼻的泥土香。金黄的稻谷、红艳的辣椒、橙黄的南瓜、饱满的黄豆，还有花生、山芋、菊花……一挨响晴的秋日，乡亲们便忙不迭地晒起秋来，为的是风干其中的水分，更是要借秋阳来完成对果实的沉淀。这些历经秋阳浸润过的果实，足以平安地度过漫长的寒冬。

清晨，推开柴门，母亲手搭凉棚向东一望，但见刚跃出地平线的秋阳，正柔和地洒向家家户户的晒场。她急着把劳作的收成，摊开到这暖暖的天光之下。她催促家人赶紧把场地上堆积如山的稻谷摊开，自己则搬起一筐筐花生，脚步带风地跑上跑进。晒好花生后，转身扛来两条大板凳，间隔约莫两米放着，拿来几把锄把和几根扁担横担在板凳上，再铺上一床竹席，然后用床单背来一大包蓬松的新棉摊放在席上。随后，又拿起针线，将竹篮里的红尖椒穿成几大串，挂到屋檐下。屋后的院落，也不能闲着，母亲在低矮的墙头上，摆上几只竹筛和簸箕，一只晒红豆，一只晒绿豆，一只晒芝麻，一只晒瓜子……

荷

王彦明

我在河流里，也在池塘里见到了荷，当然也可以在想象里遇到荷，像遇到一个熟悉的朋友，我们可以说到过往，也可以想象凋零但更多的人习惯于沉默就像站在月光里，它洗去了浮尘，也在水面上擦去一身的疲惫。有人说到腹部，仿佛谈起另一个人和另外一段时光从绽放到败落，有一条很遥远的路要走，也有许多落叶掉进山洞。此时在星际之间，星与星正在彼此吸引。



二伯十四五岁的时候，给地主家放牛。他将牛赶上山坡，自己爬树掏麻雀、攀崖摘酸枣。有天黄昏，该挽牛回家了，他才发现少了一头牛，不敢回家，吓得躲在一处山崖下面，远远听见养父母漫山遍野呼唤他的名字，也不敢吭声。那天半夜，恰好有一支红军队伍从那里路过，他便跟着走了。

二伯跟着红军钻梢林、爬山梁，北上南下，在照金周边方圆百里的山区打游击，好几次险些丢了性命。后来，根据组织安排，他复员回了自己的小山村，当了一辈子农民。有人对二伯说，你要是多扛几年枪，革命到底，现在可不一样，你有些吃亏，难道就没有后悔过？二伯说，我的许多战友都牺牲在了战场，我能活着，就已经很幸运了，我现在儿女成行，吃穿不愁，有啥后悔的？当年我们“闹红”，可没想着当官，只是盼着能过上现在这样的好日子。

二伯一辈子都爱军装。我当兵后，每次探亲回家，去宜君看望二伯，他都要求我穿上军装。他说，现在的军装比他们那时讲究，穿着很阔气。后来，我送给他一件军大衣、一双大头鞋，他很喜欢，一到冬天都会穿上，在村里走来走去，很是得意，经常有人说，我侄子是军官，这是他送我的。

二伯每次见到我，不管聊什

父亲则骑在板凳头上，拿起一个个山芋，对着绑在凳头的刀片，一来一回地刨着山芋片，不一会儿，嫩汪汪的山芋片便堆满了大木盆。他将山芋片倒进大箩筐，架好木梯，提着箩筐爬上瓦屋顶，一手扶筐，一手抓起山芋片，像撒种子一样，将它们均匀地撒在青瓦之上。摆满整齐柿子的竹簾也被父亲送到了屋顶，和柿子先后抵达的还有一簸箕的板栗、一竹筛的黄菊……

左邻右舍都在忙着晒秋，张婶在场地上摆放南瓜，李叔在檐下悬挂玉米棒……一筐筐、一匾匾，就这样被乡亲们麻利地从田间搬到了晒场。

回乡小住的我，兴致勃勃地爬上门前的那道山梁。放眼望去，只见山山岭岭，秋草一片金黄，乌桕红艳似火，松柏流翠泻绿……就连红砖青瓦，也在美滋滋地晒着秋阳，房前屋后，全被秋收的果实摆得满当。乡人晒秋，摊开的是丰饶的生活册页，每一页都有鲜活的劳动细节和庄稼的底色。

晒秋，晒出了皖中丘陵人家丰腴而又殷实的家底，也晒出了乡亲们埋在心底的喜悦。我要把这一幅幅晒秋场景摄影下来，带回城里去，好让怀乡的人们慢慢欣赏、悉心收藏。

不久前，我应邀陪同县局同事到县城一栋居民小区，慰问覃正双烈士的母亲。走进老人家的卧室，赫然映入眼帘的依然是挂在墙上的那块用黑布蒙住的镜框。它让我的心又一次隐隐作痛。

33年前那个初冬的夜晚，26岁的民警覃正双跋山涉水40多公里办案归来，刚端着碗准备吃饭，就接到石门县壶瓶山林业派出所求助：三名警察在查处一起破坏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珍稀植物案件时受到当事人围攻，请求警力增援。覃正双放下碗筷，与同事覃道平急忙赶过去。在反复做工作收效甚微的情况下，他们商量决定，由覃道平留在现场维持秩序收集证据，覃正双将闹得最凶的刘超群带回派出所审查教育。回所途中，在一个石板路段拐弯处，刘超群借天黑掩护伺机挣脱逃跑，被覃正双疾步追上。这时候，丧心病狂的刘超群突然从腰间拔出一柄25厘米长的尖刀转身刺向覃正双左胸，一股热血顿时从他的心脏部位喷涌出来。猝不及防的覃正双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仍

么，最后总会绕到他当年“闹红”的事情上来。他年龄大了，许多家务事讲得颠三倒四，但“闹红”的事情却丝毫不乱，讲得头头是道。我都默默地记在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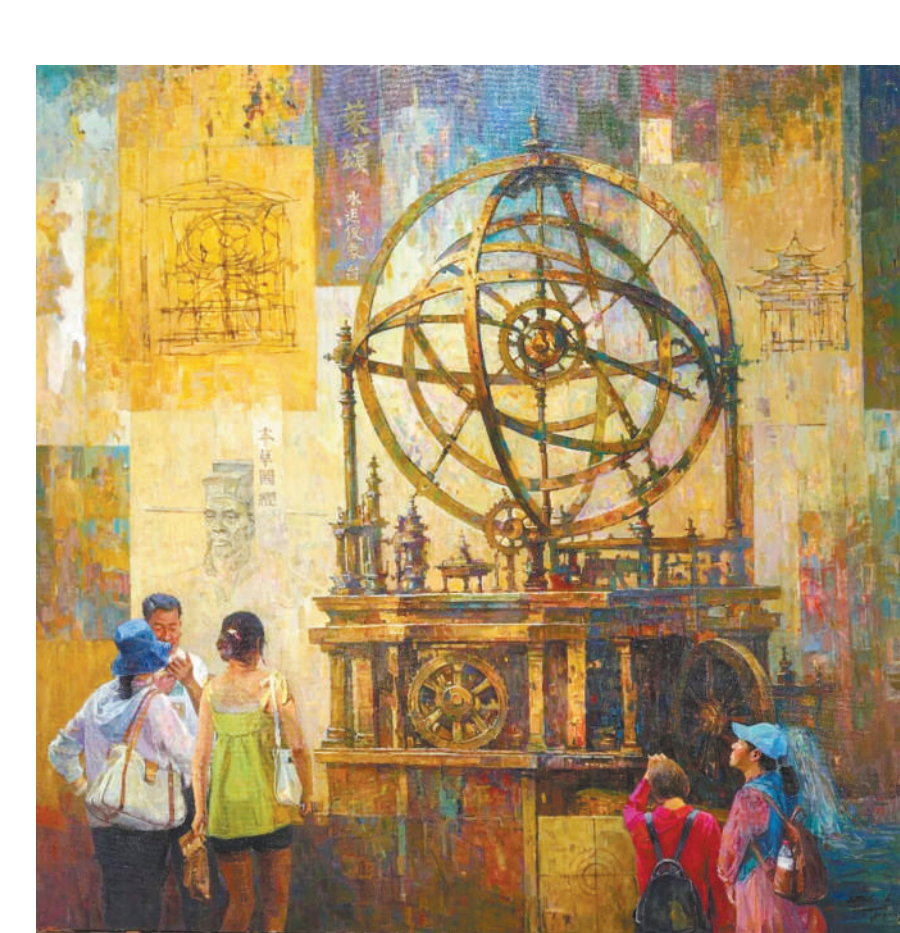
因为二伯的缘故，我开始研究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历史。每次回老家探亲，我都会挤时间到照金、南梁、陕北一带考察当年的战场环境，搜集历史资料和民间“闹红”故事。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想请人撰写一部有关这段历史的长篇小说，陈忠实老师推荐了我，说党益民出生在那一带，对那段历史研究了很多年，又获得过鲁迅文学奖，应该能写好这部书。我接受了这一任务。当时我正在国防大学进修，白天上课，晚上写作，一年时间便拿出了初稿，又历经两年四次修改，《根据地》在2015年出版发行。

但是那时，二伯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这些年，尽管我在高原戎边，但利用探亲休假的机会，先后去过照金十几次，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1932年，红军进入照金地区，创建了西北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照金地处关中与陕北交界，进可攻，退可守，红军作战机动性很强。雄踞于午岭南段的薛家寨，是当年红军的指挥部；半山腰的4个天然岩洞，是红军医院、

修械所、被服厂与边区特委驻地。我第一次登上山势险峻、孤悬半空的薛家寨，看到狭小逼仄、难以抵挡寒风冷雨的岩洞，很难想象红军当年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就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面对敌人“围剿”、队伍失散等挫折失败，坚持真理，宁死不屈，为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扩大做出了不懈努力和巨大牺牲。在国民党军队进攻薛家寨的危难时刻，红军浴血战斗，数名女红军弹尽路绝，纵身跳下百丈悬崖。女红军同风云挂在半山腰的树枝上，幸存了下来。她摔伤了腰，终身站不直，走路只能侧身挪步，但她性格刚硬，不忘红军本色，精神屹立不倒。照金的失陷，使得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人周冬至、王万亮、王满堂等人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红军用鲜血和生命，在这片根据地上矗立起“照金精神”的灵魂；“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顽强斗争的英雄气概，扎根群众的工作作风”。后来，红军在众多国民党军队的围攻下，被迫北移南梁，转战陕北，将陕甘边苏区连成一片，使得这片根据地，最终成为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我每次去照金，几乎都能见到宋建斌。他曾担任照金纪念馆馆长，现为铜川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他走出书斋，将大部分时间用



▲油画《此刻与千年》，作者张峻明。

拦腰抱住凶手，与之展开殊死搏斗。一场正义和邪恶的较量在“湖南屋脊”那条昏暗的石板路上悲壮上演。穷凶极恶的歹徒见逃跑无望，继续持刀砍向覃正双的头部和双腿。即使在倒地无力气息奄奄的情况下，覃正双箍住刘超群的双手仍然没有松开，直到闻讯赶来的覃道平将凶手制服。生命垂危之际，覃正双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遗言

那块布蒙的镜框

少一

是：“道平，小心啊，他、手、里、有、刀、……”覃正双倒在血泊之中再也没有站起来。这个年轻的生命就像一朵鲜花，还来不及向世人展示自己的芳华，就凋谢在了战友的怀抱之中，凋谢在了人民警察忠勇无畏的职业岗位上。

从覃正双烈士牺牲的第二年起，每逢清明和国庆前后，我都要陪同各级领导去他的坟上祭扫，慰问他的父母，以寄托我们的哀思和追

于基层调研。他说，党史在馆所案头，也在田间地头，在老百姓的心里。他见证了这些年来照金精神的传承、创新与发展。铜川市对红军岩洞、战壕、哨卡进行加固维修，疏浚整治山下河道，修建生态围堰，登山步道、生态栈道，有效防止了水土流失，景区如今是山青水碧，林木葱郁。同时，红色资源从“静态陈列”变为“动态传承”，“马灯闪耀”红色宣讲团和“红”孩儿宣讲团很活跃，推出“沉浸式”红色教育模式，“照金精神”走进了校园。

照金北梁红军小学是一所特别的小学，“上课听军号，班级称作连”。从前这所小学是土坯房教室，一块木板当黑板，开水加馍当午饭，如今已成为一所完全小学，建起了楼房，有了明亮的教室和宿舍，孩子们喝上直饮水、洗上热水澡，教学用上了电子白板。在支教老师的帮助下，教育质量逐年提高。娃娃们从这里走向中学、大学，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近几年，许多“照金娃”返乡创业，开启了动人的新生活。

我的父辈们，一辈子都没能走出黄土地。但是他们的子孙们，有些早就离开了乡村，工作生活在西安、成都、北京、上海等都市。有的还出国留学，成为家族里的第一代博士。更有意思的是，二伯有个侄孙，大学毕业后到江西工作。也就是说，他从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出发，一路奋斗，最后落脚在了红军长征的起点。更多的子孙们仍然生活在照金这片热土上，种地、养猪、做生意。二伯的大儿子，是我们儿女辈的第一个“公家人”，但他并没有走远，工作生活在离照金很近的铜川市区。我们两三年没见面了。前几天，他在电话里告诉我：“咱这里通高铁了，从铜川到西安只要半个小时。延安到瑞金的高铁也通车了，交通很方便。我准备抽空去瑞金逛一趟。”

大地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

本版邮箱
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程红

仲秋，一轮圆月升上山脊，清辉漫过秦巴山林，月色中，攀附在老树枝干上，长七八厘米，粗三四厘米，鼓鼓囊囊、紫莹莹的八月炸，在秋风里轻轻摇晃，清冷的月光催熟了它们。

当山风开始带上凉意，当朝阳刚刚升起，这份藏在深山里的惊喜便陆陆续续炸开了。没有爆竹的震天声响，那些悬在藤蔓间的瓜中好汉——八月炸，熟透时，顺着果身的棱线啪的一声裂开，向秋山敞开心扉，袒露出银白密润的果肉，乌黑的籽镶嵌其间，满腹的香甜，毫无保留地交付给秋山、秋阳，还有吹来吹去的秋风。果香在幽谷中悠悠回荡。

八月炸，学名三叶木通，乡人们又叫它野香蕨。暮春四月，灌从藤蔓间，绿叶初展，三枚小叶聚于一柄。一穗穗八月炸花隐在其间，两朵绛紫的雌花居于花序最下端，三枚宽大的花萼舒展翻卷着，娇娇的，嫩嫩的，上方簇拥着细碎的淡紫雄花，在春风里播洒着巧克力味的香气。它们不与山花争艳，静静地酝酿秋日的山果。

待到花落尽，藤蔓间坠下一枚枚青莹莹的小果，在绿叶庇护下慢慢膨大。

有年轻的爸妈带着孩子来到山林，孩子们欣喜地在林间奔跑，欢笑，又唱又跳，眼神清澈。有时他们在树下，“爸爸，看，那个果炸开了！”声音甜甜的，脆脆的。

作家都喜欢写故乡，但与故乡的关系向来复杂。一直以爱故乡、写故乡闻名的汪曾祺，早年在给沈从文的信中便这样说：“一个人回到乡土，不知为什么就会霉下来，窄小，可笑……回去短时期是可以的，不能太久。”汪曾祺1939年19岁离乡，42年后才第一次回去，之后一共也才回去了两次。他对故乡的眷恋，似乎都倾注给了那个记忆中的故乡。而于现实中的故乡，他是警惕的。他的老师沈从文也是这样，成名后的沈从文以“乡下人”自居，《边城》等更写尽了一个游子对故乡的眷恋，但他重返湘西写成的《长河》，却难掩对故乡的忧虑和怅惘。“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韦庄诗里藏着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文化心理。

对故乡的眷恋里，往往包含着今与昔、真与幻、梦境与现实的冲撞。然而，即便是最冷峻的乡土批判者，其眼里也有不可遏制的乡愁。鲁迅在《狂人日记》《祝福》外，写下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萧红一边刻写着黑土地上的“忙着生，忙着死”的人们和她对那一切的情愫，一边为永逝的祖父、大榆树、后花园歌哭。福克纳被问到爱不爱他南方的故乡时说：“我既爱它又恨它。那里有些东西我一点也不喜欢，但我出生在那里，那里是我的故乡，所以即便我恨它，我仍然要维护它。”有位老作家说得好：故乡是出生之地，是“血地”。“血”即是“亲”，“地”乃为“缘”，这是先天的、命定的、无法改变的一条纽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有的，但“爱”总归是前提或者说基底。

有这样一种以“爱”为基底的情感，对作家写作而言是极为关键的。那个被我们眷恋着的精神故乡，常常是我们情感和意志的投影。其实，跟实际的故乡相比，精神故乡往往显得更为真实。这也就让我们理解了，何以祖籍河北南皮、生长在北京的王蒙，会把新疆伊犁巴彥岱追认给他的故乡；而同样生长在北京的史铁生，会对陕北那个遥远的清平湾念念不忘。他们都是因各种原因离开了故乡后，于他乡找到了另一个精神上的故乡。

不过，对精神故乡的确认，并不会完全替代那份特殊的“眷恋”。情感需要寄托，理想渴望塑形，故乡作为载体，可谓顺理成章。更关键的是，由那条“先天的纽带”，我们所得来的并不只是血肉、语言、习性，还有那块土地和我们有关的生活、情感、记忆。

汪曾祺年轻时对故乡并不很眷恋，但他信中说的那样。眷恋是在花甲之年才涌到他笔端的。《异秉》《受戒》《大淔记事》《岁寒三友》等不仅复活了一段逝去的历史，更复活了一种温情脉脉、自洽自足的生活方式，一种古朴又现代的文化 and 文明形态。但对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和文明形态的复活，汪曾祺起初是下意识的、不自觉的。自觉发生在1987年。这一年，他去美国爱荷华，在家信中说，和两位美国黑人学者聊天，他才知道，“他们没有祖国，没有历史，没有传统。他们的家谱可以查到曾祖父，以上就不知道了”“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从非洲什么国家，什么民族来的。非洲人也不承认他们”。汪曾祺说：“我从他们的谈话里感到一种深刻的悲哀”“我这才感到‘根’的重要，祖国、民族、文化传统是多么重要啊”。

汪曾祺年轻时倾慕意识流式的现代主义，但当他踏上年轻时倾慕过的现代化的西方后，他才发觉了“根”的重要。所以他去美国后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由此开始自觉主动地追寻故乡。而故乡已不再只是他出生和长大的江苏高邮，而是以高邮(以及河北张家口和北京)为显影的整个中国。

汪曾祺的经历告诉我们，不管对于故乡我们怀着什么样的情感，只要 we 开始写作，就已经开始了对故乡的重返或者说重建。只是这个纸上的故乡并非一个具体的实在，而是我们赖以存在的生命记忆与情感依托——这亦是我们的“根”。

孩子们最感兴趣的便是八月炸。够不着，就央求爸爸妈妈抱起他们，小手使劲儿地揪下一只八月炸。捧在手心，久久盯着紫褐温润的果子，满心期待它崩裂时的奇妙刹那。因为八月炸，大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几只山鸟站在高高的树枝上，歪着脑袋东挑西挑，选中一个刚开裂最香甜的八月炸，开始愉快地用餐了。它们把头扎进去，猛啄几口连籽吞下。扭头用小而黑亮的眼眸望向湛蓝的天空，抛出一串婉转悠扬的啼鸣。

有年轻的爸爸爬上树，穿过蝉的叫声，穿过鸟的歌声，向刚炸开的八月炸伸出了手。

孩子们捧着从藤蔓间摘下的八月炸。咬下一口，紧抿着小嘴，甜蜜蜜的笑满满脸。八月炸的味道可真不赖，软糯滑嫩，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们笑咪咪地吃着，乌黑的籽从他们嘴角滑落。遗憾的是，八月炸的籽特别多，每一粒都被果肉包裹着，吃八月炸必须慢慢品，急不得。连小小的孩子们也懂。

最美味的食物往往“生命”最短暂。八月炸的保鲜期只有短短半天。正因为这样，它很难被人们送到遥远的城市里，成为锁在山谷里的美味。

多么渴望，有朝一日，经过改良的八月炸，走出秦巴群山，像香蕉那样，走进千家万户。